

流金岁月——冯其庸先生在人大国学院

孙家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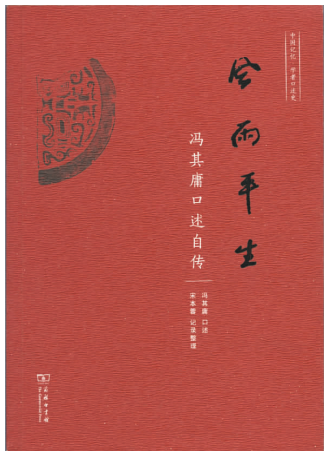
“这个院长,我要么不做,要做就要认真负责地做、有职有权地做。我不是来担任虚名的院长。”冯先生是如此说的,更是如此做的。冯先生提出要聘请有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的退休老先生来国学院授课。这就是国学院五大“特聘教授”的缘起。

2017 年 1 月 22 日下午,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来电,告知了冯其庸先生于午间逝世的噩耗。我尽管思想上有所准备,但是,依然抑制不住悲从中来!我有幸认识冯先生,始于中国人民大学 2005 年创立国学院。当时,人大学校领导礼聘校友冯其庸先生担任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早年间曾经在人大中文系任教,后来奉调离校,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副院长至退休。冯先生受聘为国学院的首任院长时,已经是他荣退十年之后了。也许,有的人会认为一位早已退出人大人事系统之外、已是 81 岁的高年长者担任的国学院院长一职,应该是“荣誉性”的职位,冯先生既不会、也不必亲自过问学院的具体工作。但是,上述出于常识性的推测是不对的。冯先生

◀ (上接 3 版)

成立《红楼梦》写作组,冯先生被调入。这是冯先生开始研究《红楼梦》的开始。不言而喻,这类写作组要完成的主要是政治性的写作任务,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从此以后,在写作任务之外,冯先生开始认真研究起《红楼梦》的版本、曹雪芹的家世来,即使是政治任务的写作,毕竟也要熟读《红楼梦》。另一方面,应该是考虑到写作组的临时性,1974 年前后,冯先生曾经调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写作组去,但当年 10 月,国务院成立《红楼梦》校订组,由文化小组副组长袁水拍当组长,冯其庸任副组长。校订组是毛主席同意的,而最初的建议就是冯先生提出,报告也是冯先生起草的。于是,红学成为冯先生的主攻方向。

《红楼梦》在中国已经热了很多年,尤其是最高领袖重视《红楼梦》,红学于是获得了最社会化的影响。但是,《红楼梦》竟然没有一个校注本,对于红学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基本的遗憾。于是,校订组开始从全国抽调学者参加工作。1976 年,校订组已经有了不少成绩,但在这个多事之秋,校订组是否解散曾经是一个问题。当然,最后还是保留下来。到



《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1979 年 1 月,在校订组的基础上,成立艺术研究院所属的红楼梦研究所,5 月决定出版专业刊物《红楼梦学刊》。1980 年,中国成立红学研究会,吴组緃出任首届会长,冯先生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从《红楼梦》写作组,到《红楼梦》校订组,再到研究所,最后出版学刊,原本一个政治色彩极浓的写作组,完全转轨成为正规的学术组织。冯先生担任研究所的所长和学刊主编(另一主编是王朝闻先生),红学的著名学者都参加了编委会。这个转变对于中国红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冯先生是促成这个转变发生的关键人物。

1980 年 7 月 2 日,俞平伯致冯先生的书信中写道:“红



《瓜饭楼丛稿之冯其庸文集》

楼》本是难题,我的说法不免错误,批判原可,但不宜将学术与政治混淆。”(“语可诤人,光可鉴物”,见《剪烛集》)俞平伯是红学政治化的受害者,对于红学正在发生的巨变,他的感受可想而知。在所有的学术都饱受政治化影响的时代,似乎只有红学走出了个相反的方向。冯先生驾驭了潮流未免太夸大了,但冯先生利用了形势,应该是不错的。这种利用,正是学术化的正途,红学从此避免陷入更深的政治泥潭,踏上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康庄大道。《红楼梦》校订组是一个良好开端,在“文革”结束之后,乘着拨乱反正的东风,红学快速走进新时代。或许,在冯先生的心中,有一个无锡国专时期形

量,提升了学术影响力。五位特聘教授之中,除了庞朴先生受聘到他的母校山东大学任教、谢桂华先生因患癌症而不幸逝世之外,其他的三位先生,都在国学院任教多年。其中,傅璇琮先生 2006 年指导的博士生卢燕新,日后完成的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冯先生提出:要不惜重金聘请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到国学院任教。他对我说过大意如下的话:“以重金聘请人才,是我们表达尊重人才的诚意。人大提供的工资,不足以吸引真正的优秀的教授来国学院任教。你们负责用心物色人才,我来设法解决聘任人才的经费来源问题。实在不成,我可以卖字画来筹钱请人。”我当时听了,极为敬佩!在国学院的筹建过程中,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适时给我

专业?哪个专业都胜任。陈寅恪曾经被中文、历史两个系聘为教授,一时传为佳话。胡适呢?虽然当时有人认为胡适的国学功底不足,但从今天的眼光看,恐怕也是文史哲都有资格做教授。冯先生以及他的先生的那代学者,有学术,能创作,多专多能是很普遍的,所以大师纷出。在探索其中的原因的时候,人们强调中西融合的意义。当时中西融合能够创造大师,今天不是同样存在中西融合吗?如此分析,我们今天缺乏西学吗?今天中西交流的程度降低了吗?今天中西交流的机会变少了吗?显然都不是。比起曾经的学术大师来,我们今天缺少的其实是国学教育,不仅缺少古代经典知识,也缺乏对文化传统的尊重与温情。在满怀中国文化自卑感的人群中,数典忘祖很容易,融合中西太难。

冯先生治学广博,来源于他接受的国学教育。书法家、画家、摄影家、戏剧学家、红学家等等概括冯先生的学术人生的词里,恐怕还是国学家更恰当。作为国学家的冯先生,他的人生是精彩的,对于后学,是富有启发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 (下转 5 版) ▶



罗马广场



图拉真市场

图片为作者提供

◀ (上接 12 版)

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给予美化拔高的民族英雄。类似布狄卡 and 阿尔米尼乌斯 (Arminius, 公元 9 年日耳曼部落叛乱的领袖) 这样的人原先都是罗马的合作者,或者说所谓的地方精英,起义的导火索往往来自个别罗马官员或其手下轻率的挑衅与侮辱行为,致使双方的合作关系破裂(512 页)。可以说,比尔德同时对两方面(一方是妖魔化,另一方则是神化)进行了祛魅。

除了对以上这些“历史刻板印象”以及“成王败寇”式的历史逻辑的探隐发覆之外,本书中还穿插了大量篇幅来还原和展现占罗马人口大多数的底层平民、妇女、穷人和奴隶的生存处境(尤其是第八章“大后方”与十一章“富人和穷人”)。这些同样是被由权势者和精英所主宰的历史忽视、遮蔽、唾弃甚至歪曲的人群。单从公元 2 世纪一本设定了 92 个常见问题和 1030 个标准答案的算命小册子《阿斯特拉普叙预言书》(Sortes Astrampsychi)中,便可管窥普通罗马人的日常所思所想,他们的希望和期盼、恐惧和焦虑。有些与今天的人无分二致,例如对健康、婚

姻、家庭、子嗣、生计和财富的关注,另一些则带有鲜明的罗马印记——问题中包括了“我是不是被下毒了?”,“我是不是要被卖了?”,以及“我有一天会获自由身吗?”(465 页)

当今的古罗马研究日新月异,综合运用考古发掘和现代科技手段所得出的新材料和新发现不断涌现,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罗马世界的全方位认知。如借助对冰川、化粪池里的消化物残渣、人类骸骨牙齿的生物化学分析而重现古罗马的气候环境、罗马人的饮食结构及人口流动模式,已然成为现实。许多类似的前沿研究,如贫穷史、环境史和性别史的研究成果都在本书中得以呈现,作者不断追求新知的热情和开放包容的学术心态由此可见一斑。比尔德就是这样,无论在史料还是理论的运用上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通过讲述不起眼墓碑、涂鸦 (graffito)、甚至生锈的妇科内窥镜背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历,辗转穿梭于同时作为物质遗存和“记忆之场”(lieux des mémoires,借用皮埃尔·诺拉的概念)而存在的古迹废墟,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古罗马世界。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师)

演化论是否推动了美国废奴

编译/高曜

1959 年底,英国出版了《物种起源》一书。达尔文亲自将此书寄给了美国哈佛大学植物学家阿萨·格雷(Asa Gray)。格雷在这本新书上做了许多笔记,随后把书借给了妻子的娘家兄弟、儿童福利活动家查尔斯·洛林·布雷斯 (Charles Loring Brace)。恰逢布雷斯前往马萨诸塞州康科德演讲,便把书带到了政治家富兰克林·桑博恩(Franklin Sanborn)家里。1860 年新年,布雷斯和桑博恩等四人围坐在康科德的一张餐桌边,思考着这本面世不过一个月的书,另两位是哲学家布朗森·奥尔科特 (Bronson Alcott) 和作家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也都颇具声望。

兰德尔·富勒 (Randall Fuller)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书《一本改变美国的书》(The Book That Changed America:How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Ignited a Nation)中提出一个观点:达尔文《物种起源》最初在美国的传阅,催化了美国的废奴运动,并由此改变了美国。

格雷和康科德餐桌边的那四位读者一直都热衷于推动奴隶制度的废除。其中,只有格雷对达尔文演化论中深奥的生物学细节感兴趣,其他几位的关注点都在于书中所提示的关于人种的内容。

结合《物种起源》的字面内容,最早这几位读者的读后感无疑是很古怪的。因为达尔文在书中小心地回避了人类演化的问题,对种族问题更是只字不提。尤其是在结论中,达尔文丝毫未有可能具有煽动性的、容易被认为是异端的措辞,也并未直陈:尽管人类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的,但实际上是演化而来的。他在 500 页的作品中,只用短短 12 个内敛节制的词汇一笔带过这个敏感的问题:Light will be thrown on the origin of man and his history(人类的起源和历史终将被阐明)。

然而,这足够了。每个人,包括康科德餐桌边的四位,分明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达尔文内心的声音:人类,就像其他物种,是通过自然选择从自己的祖先那里演化来的。

那么这与废奴运动有何关联呢?当时的人们正在热烈辩论,人类是单一起源,还是不同种族独立起源?多重起源说广受为奴隶制辩护的人们的欢

迎。按照他们的想法,亚当夏娃创造白人,而其他种族来源于更早、更低级的生物,由此,白人可以对非上帝创造的非白色人种适用不同的道德标准。多重起源论者往往认为,黑人只是近似于人类但是比人类低级,或者压根就是从其他物种来的。这就是白人借以奴役黑人的说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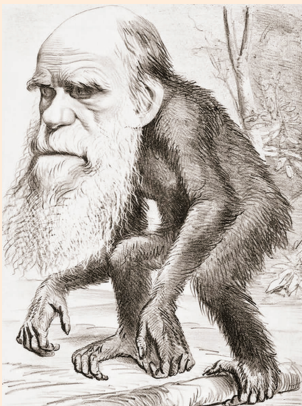
但是,如果人类是单一起源——就像达尔文认为的——与其他物种的起源一样,那么黑人和白人就相当于遥远的亲戚,那么奴隶制在道德上就无法立足了。在演化生物学史上,这种情形可能并不多见——达尔文的想法和《圣经》的字面意思是趋同的。《创世纪》也持人类单一起源说,奴隶制的支持者忽视了这个细节。根据富勒在书中所揭示的,达尔文之所以令格雷和康科德诸位感到兴奋,是因为提供了足以推翻多重起源论的科学

的理由。

富勒新书中还有一部分有趣的内容,呈现了康科德知识圈的面貌。他笔下的人事范围宽广,包括许多别具色彩的人物:比如奥尔科特的女儿露易莎·梅·奥尔科特 (Louisa May Alcott),她在作为《小妇人》的作者而家喻户晓之前,写过不同种族之爱的故事,尽管这在当时是必然无法发表的;哈佛教授路易斯·阿加西斯 (Louis Agassiz) 是种族主义和多重起源论支持者,近乎不共戴天地反对着达尔文的理论;约翰·布朗 (John Brown) 试图主导一场奴隶反抗,最终失败,桑博恩曾暗中给他提供过经济支持;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 由一名奴隶奋斗为演说家和作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遗憾的是,富勒搜集的这些丰富的素材仍然不足以支持他的论点——达尔文的书为废奴主义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并最终导致了美国内战。

首先,康科德的废奴主义者们尽管从达尔文的理论中找到了依据,但他们在道德层面对奴隶制的谴责其实在此之前就已经很强烈了,对 1861 年美国南北战争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力潜移默化,持续“闷烧”了几十年。第二,达尔文的观点其实也给了奴隶制的支持者们以匕首和



1871 杂志上刊登的达尔文的讽刺画。 资料图片

投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选择性地采用了达尔文的观点——自然群落间的种间竞争,并因此认为白人在生存竞争中超过了黑人。就像《圣经》本身那样,“起源”的话题被不同的观点断章取义地加以利用,去支持多样化但经常彼此冲突的意识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起源”问题所带来的真正革命:在涉及生命史的讨论时,人们逐渐用纯粹的自然主义的解释取代了神圣的创造论的观点。在此书出版后的十年中,几乎所有美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都接纳了达尔文的观点。这不仅改变了生物学的环境,也修正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上帝创造人类的观点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是随时出现变数的自然界选择和洗牌的产物。达尔文在一封写给格雷的信中也不讳言:人类的演化是和上帝无关的。

然而,或许是因为信仰的因素,富勒书中的五位主人公中有四位最终并未坚持到底地接纳达尔文的观点,只有梭罗,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正是在处理康科德的林地数据中度过的,但他也未能完全接受达尔文的自然主义观点,比如他认为科学在解释情感和行为方面仍然是无力的。

自 1860 年至今,事情似乎并无多大变化。2014 年,一项盖洛普调查显示,42% 的美国人是反对演化论的地球创造论者;31% 是神学演化论者,接受某种形式的人类演化,但坚持认为这是由上帝指导的;只有 19% 坚持达尔文自然演化的观点。

(本文编译自芝加哥大学生态和演化系教授 Jerry A. Coyne 发表于《华盛顿邮报》的书评)